

从寻求革命道路 到河溪地下党组织的重建

——回顾河溪地下党斗争生活

孙 正 辉

回忆历史，河溪地下党组织因有人叛变，于一九四〇年遭到全部破坏。当时我正小学毕业，白色恐怖的阴影，在我单纯的心里，只留下一点神秘的感觉。而“读书救国”却在我心上是一股动力。我勤奋学习，成绩优良。

当我初中毕业，考入四川省立阆中中学高中部读书的第二年，由于家庭经济急剧崩溃，面临周围丢来的冷眼和笑脸，国民党现实生活的冷酷与黑暗，我深感自己前途暗淡，思想上产生了悲观苦闷的情绪。这种情绪的产生，使我忽视了学习，想在“学习外面”去寻找新的生活道路。在这条路的追寻中，我又感到十分茫然，我的心里有着不能宁静的矛盾。

一九四七年，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，由何钧石介绍，去东岳庙小学教书。初走进社会，在接触了解社会的时候，也是我思想开始大转变和形成的时候。在学校工作的日子里，我深受进步青年何钧石的影响，他在成都协进中学读

书时，精心收买的马列主义书籍百余册。他秘密指导我阅读共产党宣言、国家与革命、左倾右稚病、政治经济学、论政党（为党员工作手册，附有七大党纲党章）等书以及新华日报（旧的）和一些新的进步的文学作品。特别是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，我逐渐懂得了一点革命理论，信仰共产主义、崇拜中国共产党。我迫切希望找到党的组织，让自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为革命献出一切力量。

在将近两年教书的日子里，由于我们的接触和言行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，我们受到监视，不能再工作下去了。此时——1948年夏，恰逢常德群从重庆松花江中学回乡开辟革命活动基地，在他的启发中，在华蓥山农民暴动（华蓥山起义）的影响下，我和何钧石回到农村，联络了在苦水井教私学的罗碧星，我们分别在曹家沟、何家坝、孙家坝等地搞起了农运工作。我们从《论政党》这本书里学到了组织领导群众的方法，并结合实际，首先把一些贫苦的农民青年以抗丁的教育内容激发其觉悟，建立了“农民学习小组”。当时我们有一套计划，即：组织一训练——武装。为了武装，我以经商为名，出卖田产，用作革命经费，救济贫苦农民，暗中购买枪支弹药，准备时机成熟，搞武装暴动。
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川东工委负责人卢光特^(注一)派袁铁宇^(注二)同志来阆中开辟新的革命基地。并带“六一社”成员杨韬、朱爱群、侯光恺与常德群接上了头（在阆中省立高中一图书室里），开展党的工作。我们（即何、罗、孙）通过常德群的关系，先派老罗带一把丝（作接头暗号又作经费之用），在阆城管星街“不通路”小巷陈和文家与老袁接上头。老罗汇报了我们在河溪农村开展的农运工作情况，十分满意，并约定时间与何钧石接头会面，我亦同行。此事至今，我仍清楚的记得在阆城横笔向街 2 号陈家院里。院里空空的，无人居住，只见一看守房门的佣人，是一中年妇女。她打开厅房，袁铁宇随老何进入里面一间屋坐下，我留在外屋，老何示意我注视外面行动。三小时后，我们出门，平安分手了。在回河溪关的路上，老何向我讲他入党了。我问怎样入党的，他说：依据常德群先有情况的介绍，又根据多年追求进步的活动和马列主义书刊的收藏，特别是我们自发的农运工作，等等。他非常满意，愿作我入党的介绍人。我已写了自传、个别宣了誓：至诚信奉马列主义，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遵守……永不……就这样入党了。我听得颇感神秘，心想，我能入党么？老何似乎摸透了我的心情，说：“我已向老常谈了你的情况，

你可以考虑写份自传，七月底到八月初，他要到我家，路线我已向他说清了，不走大路到河溪关场上过，走小路过新开渡、翻大垭、李春垭，过孙家坝、俞加坝，找我父亲何尊一即可，不会被人怀疑……”。

七月下旬的一天，老袁从阆城出发了。按照老何说的路线，过了新开渡，走到李春垭，太阳已落山了，黑夜即将到来，他心急，神情不定，忽从哨棚里出来一个人，大声问道：“喂，搞啥子的？走哪里去？”这突然一问，他心一惊，满口外地人腔，急忙说：“去何先生家。”哪个何先生？他忙着说：“何尊一”，哨棚里另一个人大声吼道：“不管何尊一，何尊二，我们认不倒，你当壮丁去！”这么一声，老袁急了，摸了摸眼镜，取下说：“你看看，我能不能当壮丁……”对方看他模样，谈吐文雅，年已三十出头，视力不好，俨然是位教书先生，就放他走了。

夜来了，他沿着大路走到俞家坝地界的竹林湾，见对面有一人家灯火，他大声呼喊问路。好心的莫治国（解放后我查得的）引他到了何家时已夜深人静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我去何钧石家，问老袁来了否。老何一笑说：“来了又走了，坐滑杆走了，去水观了。”我问为啥来了就忙着走，老何说：“他怕，怕昨天在李春垭发生

的事透了风,有危险。’沉思片刻,他点燃香烟又说:“水观的王某我了解,不可靠、危险。’我追问王是个什么人,他说一言难尽,以后看嘛!

八月七日,老袁第二次又突然来何钧石家,他看完了我的自传,又根据老何再次口述详情,他同意我入党。当天夜里,在暗淡的桐油灯下,举行入党程序,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感到无上光荣。一夜难眠,兴奋至极!

八月十五日,老袁第三次来到何钧石家,罗碧星亦到。在老何的寝室里,老袁大讲了革命形势和蒋党急剧崩溃的情况,说急需在农村建立党支部、吸收党员、大力发展农运工作。为此老袁即宣布取消我的候补期,转为正式党员,并指定何任书记,罗任组织委员,我任宣传委员。与此同时,常德群在常家沟也建立了一个支部,支书是朱洪昌。这就是河溪地下党组织的来历,也是河溪地下党组织自一九四〇年遭到破坏以后重新建立的党组织。这个组织的建立,为迎接阆中和平解放出力,作了贡献。

九月初,袁铁宇去成都向上级汇报工作,常德群另有任务去西充。何钧石赴成都治疗胃病,杨韬同志从水观调来河溪,驻何家坝支部何治平家负责联络。在他的联络下,我和徐是辉接上了头,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。十月末,除

何家坝、常家沟支部还新建立了孙家坝、老土地支部以及五马桥七里张家湾两个党小组。由于党组织发展壮大，成立了河溪区委。书记是何钧石，后为我担任，曾参加了有名的“白塔山会议”。

为了配合解放战争的形势，我们大力发展农运工作。在两个月内，就从原来的四坝（即孙、何、俞、李）一井（苦水井）发展到一山（高壁山）又一岩（侯家岩）一湾（赵家湾）又一沟（王家沟）。此外还有老土地、五马桥，以及罗碧星在石龙和朱洪昌在常家沟发展的农运工作。这扎实的农运工作，为我们的培养和吸收党员创造了条件。在 50 多名的党员中，知识分子是极少的三、五人，如：孙正跃、赵国远、陈登棋等。现在想来是一大缺点，是“左”的思想造成的。

书至此，这篇回忆录算是写完了。我放下笔，走上阳台，远望蓝天、白云，陷入深思。想自己年已七十有七，虽经风雨，而今离休，晚景灿烂。但一想到早离人间的杨韬、国远、登棋、丕成等不少好同志，特别是迫害而死的治平和年近八旬在病中的钧石同志，我感慨万千……。

年被划为右派，其妻与之离婚，他被驱赶至农场——长寿湖农鱼场，监督劳动。三中全会后，分配到重庆烈士陵园作馆长。后调重庆市党史办。离休后不久，突因心肌梗死，享年 73 岁。

以上情况，是作家杨顺仁与我通讯知道的。

注二 袁铁宇 —— 西充人，解放后在重庆师专工作。文革初受迫害跳楼而谢世。清理阶级队伍时，外调人员曾强迫我写过他的材料。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，杨韬同志给他写了申诉书平反。杨向我讲：袁未婚，无亲人，故代诉。

阆中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点滴

侯泽周 周克忠

最广泛的“爱国统一战线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一切困难，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。历史证明，什么时候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，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革命就不断取得胜利。反之，革命就受挫折。建国初期，由于正确执行了统战政策、民主改革、统购统销、一化三改造等，进展非常顺利。从1955年的社会肃反扩大化，1957年的“反右派”运动、反右倾、拔白旗、小四清，到1966年开始的为期十年“文革”，这20余年，极左运动不断，统一战线工作流于形式。党的老统战工作者被打倒，统战对象、各民主党派、工商界不少成员被划为“右派”、“资产阶级分子”、“历史反革命”、“地、富、坏分子”等等，一夜之间，朋友成了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，有的被管制、劳教、劳改，有的致残或致死。文化大革命，从上到下把统战部、政协都砸了，统战系统处于“万家墨面没蒿莱，敢有歌吟动地衰”的境地。

建国初，阆中的统战对象较多，统战工作面宽量大，一直是县委书记或县长兼任统战部长，部里只设副部长和办公室做具体工作，这时的统战工作也很顺利。到 1955 年的社会肃反和 1957 年的“反右派”运动，大多数统战对象成了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，仅阆中就有几百人。如老知识分子、政府副县长郑××，回族出身的地下党员，正县长冶××，南下干部、检察长李××，县政府工商科长（工商业主）柴××，流落红军陈××等，有的打成了右派，有的打成了叛徒、特务、历反，被管制、劳改、劳教，大多数下放农村监督劳动。接着是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，政协、统战部的工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。1977 年 3 月，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，8 月份他在中央党校明确提出：“在一切工作中都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。”讨论问题一定要畅所欲言，讲真话，要独立思考，不要人云亦云，不要顾虑重重，讲违心话。为此，我们要认真实行‘四不主义’，不抓辫子、不戴帽子、不打棍子、不装袋子（档案袋）”。这时中央不少老同志提出要为‘四、六天安门事件’

和“六十一个叛徒案”以及一切冤假错案平反，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。1978年4月20日耀邦同志又给华国锋和政治局各位委员写信，明确指出“两个凡是”的提法是错误的。随即中央发了（1978）55号文件，1978年12月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，陈云同志提了六条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意见。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制定了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拨乱反正的路线和各项政策。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由此在全国全面展开，中央还组织了1000多人的工作组到全国各地检查、指导、督促落实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。

中央55号文件下达后，阆中县委及时组织清理历史案件。统战部积极着手清理属统战部管理的案件。面宽量大的是257人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，这部分人数量多，困难大，情况比较复杂。在执行政策上有个别单位、个人，极左流毒较深，不按政策办事，总认为被落实改正错划右派的人“有错误言行，有攻击党的错误”，在结论上给别人“留尾巴”，引起了被落实政策的人强烈不满，向上级反映。统战部对此及时进行了复查，取消了一切不实之词，重新结论通知本人，死了的通知家属和当地政府。个别被错划右派从外地开除转回家乡农村的，由于在处理

时未正式宣布决定，只装在档案袋和通知当地政府，本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，而当地村社又错误地对其管制生产、训活等，这部分人在落实政策时很反感，经反复做工作，宣传政策，最终落实了改正右派的政策，恢复了政治名誉，重新安排了工作。对在校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回家的，也都一一落实了政策，安置了工作。

下面列举几例当时在落实统战政策时，比较影响的典型案例：

一、错划右派陈志国。流落红军陈志国，建国后参加工作，任县委宣传部干事，肃反后调离宣传部，去东风中学任教。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，送去劳教。在落实政策过程中，有些人对他从延安回阆中这些历史，提出很多疑问，在反右运动中，言辞偏激，因此不同意改正。后经反复查证，认为他是本着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的精神说的，应该改正。在落实政策后期，陈志国的右派改正政策终于及时落实，仍安排到东风中学任教。至此阆中 257 人错划右派全部改正落实，无后遗症。

二、受林彪迫害被遣回阆中原籍的李文密的政策落实。李文密先生原系国民党的少将师长，1948 年睢杞战役被解放，通过学习后参加了解放军，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任研

究员。1970 年林彪宣布撤销南京军事学院被资遣回原籍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世居阆中城。文革中期，县里将他下放到二龙乡 八村的一个知青点上住，此时夫妇都已年近七旬，上山下坡极不方便，加之县上按月发给相当于团级 80%的生活费，老两口生活比较困难。林彪事件后，他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，中央军委落实了他的政策，作为退休。他在南京工作的儿子受株连的情况也落实了政策。阆中县委统战部部长侯泽周专程去二龙 八村看望他们,并及时向县委反映他们的情况。县上决定李文密于 1975 年秋从二龙迁回城，生活费也由 80%改为全额发给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根据有关政策，李文密被安排为阆中县第五届政协副主席。1987 年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，1990 年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厅级参事。李老在西安事变以后，作西北行营中校侍从参谋科长，在国共合作时期与党合作共事，在处理延安和八路军的军需物资供应分配方面，给与方便和支持。和周恩来、叶剑英、刘伯承等领导人有过书信往来。落实李文密先生的政策影响大，对祖国统一，海峡两岸民间往来，有较为重要的作用。

三、落实起义人员李茂实的政策。李茂实 1938 年抗日战争初期考入军校，毕业后在国民党的 20 军任排、连

长，抗战后任团长，1949年12月在金堂县起义，通过学习，被资遣回原籍。一直没有正常的生活来源，仅在一些企业做临时工，后被关押一年多，经查无新罪，被无罪释放，安排去渔业社工作。到1980年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，阆中县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时安排为政协委员，由政协发给生活费。

对在农村健在的潘亚夫、苟昭禄等都安排为县政协委员，发给生活费。至此，阆中落实政策的工作告一段落。

抗美援朝运动在阆中

蒲 瑞 康

1950年6月25日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从一个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建立起来，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，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，并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，把战火引向中国边界，派飞机轰炸我国领土丹东等地，同时，美国又把第七舰队派往中国台湾，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。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，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，中共中央作出了“出兵抗美援朝”举世瞩目的决策，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的号召。根据中央的指示，全国各地迅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。在中共阆中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时近53万阆中人民积极响应，从1950年8月开始，由城市到农村逐步发展，从机关、部队、学校迅速扩展到工人、农民及社会各个阶层，并与各项实际工作结合，以波澜壮阔之势，持续了两年多时间。这一运动规模之浩大，气魄之雄伟，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为重

点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普及与广泛深入，实为前所未有，至今牢牢铭记在人们心中。

一、建立机构，开展宣传

遵照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1951 年 4 月发出的通知，“关于全国各地应普遍建立抗美援朝分会”的精神，县各代会常委会与县委宣传部配合，邀集阆中各界人士协商，成立阆中县抗美援朝分会，在中共阆中县委领导下，开展抗美援朝工作。由县委书记兼任会长，县委宣传部和各代会常委会负责人任副会长，会址设在各代会常委会内合署办公，县委宣传部和各代常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办具体工作。

与此相应，全县十个区以及城区工商、文教、医卫、宗教各团体，成立了抗美援朝的分支组织，城乡各小学普遍建立了宣传组，区乡领导亲自安排抗美援朝工作，并确定宣教干部专人主管，层层负责，使运动发展健康有序。

组织浩浩荡荡的宣传队伍。县委宣传部全面安排组织，逐级培训宣传员，层层组建宣传组，依县境内十个区，64 个乡，建立了宣传网。与此同时，各机关单位、当地驻军（军政大学）、各中小学、各区、乡、村乃至居民组都组织了宣传队，宣传组或设置宣传员，各种宣传组织采

取口头宣传，出墙报、壁报、漫画、黑板报、印油小型刊物、印发传单、举办时事讲座、山头广播、抗美援朝图片展览，写标语、识字牌，编演文艺节目如街头剧、活报剧、快板、金钱板、莲花落、腰鼓、秧歌、唱歌、跳舞、耍杂技、舞龙灯、车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广泛在各种集会、座谈会，节日，场期、夜校、识字班组，深入街道、工地、田间、院坝进行宣传演出。这些宣传演出都贯穿抗美援朝思想教育内容。寓教于乐，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。

二、突出反帝爱国主题 主抓思想发动

毛主席教导，群众的向背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。抗美援朝运动跟正在开展着的土地改革运动，三反五反运动不同，它要求自始至终要抓好思想教育，内容包括爱国主义，国际主义，阶级斗争，民族独立，以及中国革命和国际关系事件等，反帝爱国思想是其主题。宣传教育走在前面了，群众的政治觉悟将会大大提高，正确的政治思想理论，一旦为群众所认识、所接受、所掌握，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，将推动群众投入运动中来，这是宣教工作的重要任务。当时人民群众的认识程度很不一致，一方面欢迎新社会，信任共产党，拥护毛主席，服从政府的号召和指挥。另一方面存在着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些观念和看法，

在新事物面前犹豫不定。抗美援朝问题，检验人们的心态。一些人口上不说，忧在心中，有着一连串的疑问，中国援助朝鲜有必要吗，有力量吗？我们抗击美帝能取胜吗？美国有先进武器为什么又是纸老虎？这些疑问，提出了群众思想上必须解决的三个核心认识问题。一是战争的性质，抗击美国侵略是正义战争，援助朝鲜邻邦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，更重要的是保卫祖国的安全。二是战争的前途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人，而不是几件先进武器，抗美援朝战争是特殊情况下的人民战争，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，因此我们完全有战胜敌人的信心。三是对美国应该怎么认识，老百姓只知道美国帮助过中国打日本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英法苏五大国打败了德意日强盗，是世界强国。不知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，在中国扶持蒋介石反动派，与中国人民为敌，在世界拼凑军事集团，不断挑起战争，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人民为敌，是全世界的罪魁。群众十分渴望对这些最迫切的问题，给予明确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。在宣传教育中，我们采取从正面教育入手，联系实际，有的放矢，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，深入浅出的讲述有关抗美援朝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，分析